

安葬在八宝山的 美国人史沫特莱

□ 刘 佳

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中国规格最高的革命公墓，能够安葬在这里，对逝者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是对其一生的肯定。在这个公墓里，安葬着一位被称为“中国人民之友”的美国作家，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一位同情受压迫者的美国人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892 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全家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自己和兄弟姐妹也无法得到教育。她的母亲很年轻时就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病倒，因为没有钱治病，很快就去世了，少年的史沫特莱开始了半流浪的生活。贫困饥寒的生活经历让史沫特莱深深知道底层人民的困苦，同时，也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压迫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20 多岁的史沫特莱来到纽约，白天工作，夜间在纽约大学学习。她在学习期间，因为同情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受压迫者的命运，她开始与印度革命人士保持通信联系。因为此事，史沫特莱在 1918 年被捕入狱。

1919 年，史沫特莱在往返于波兰与美国的货轮上当勤杂工，目的是希望找到那些居住在欧洲的印度流亡分子。她后来在柏林逗留，从事支持印度民族独立的活动。由于她关切亚洲的一切受压迫者，在这期间她对中国革命也开始关注。她开始读有关中国的历史，主动打听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

1928 年，她与《法兰克福日报》签订了合约，成为该报派往中国的新闻记者，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928 年底，史沫特莱到了中国东北，由哈尔滨经过沈阳、大连、北平、上海，最后到达广东。在南下的路上，史沫特莱看到中国人民在“中世纪封建主义机构”（史沫特莱语）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食不果腹，生活凄惨。当时，中国人民的痛苦给史沫特莱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她把看到的一切记述下来，并写成《中国人的命运》一书，书中流露出对中国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投身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

出于对苦难中国的同情，史沫特莱十分关注中国的革命与进步力量。在上海居住期间，她在朋友帮助下获得了一些地下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还接触到来自苏区的革命工作者。在整理了这些资料 and 人物访谈后，她写成《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该书记述了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数次粉碎敌军“围剿”、建立革命根据地等英雄壮



史沫特莱与朱德

举。红军事迹和红军精神让史沫特莱备受鼓舞，此时，她不再以绝望的心情看中国，而是充满希望地看到“红军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看到在一片黑暗的中国，有“红星”放出光芒。

1937 年 1 月上旬，史沫特莱来到陕北苏区。她首先到达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先后见到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1 月下旬，她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此次陕北之行让史沫特莱深受触动，她看到共产党人有崇高信仰，中共领导人不在乎个人的安乐、财富和权势，红军将领过着和士兵一样的艰苦生活，整个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受到百姓拥戴。她亲眼看到的事实与之前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共产党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她对共产党的领导感慨地说：“我确信，在中国的英、美记者，只要有一半一点儿机会直接向你们了解事实真相，就绝不会把那些攻击你们的国民党官方报道发出去。如果他们现在能够采访你们，他们一定会诚实地写消息。”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她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还住在 中国口岸城市的外国记者写信，敦促他们访问延安、访问红军。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消息传到延安时，延安城里号角响起，史沫特莱看到每一位红军战士为国而战、视死如归，更加被红军的勇敢和坚毅所感染。9 月中旬，她与正式更名为“八路军”的部队一道奔赴前线，途中记录下战争经历，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该书记录了八路军在物质条件极度艰苦、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依然严守组织纪律、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的经历。此时，史沫特莱不再把自己当作“外来者”，

而是八路军的一员，与战士们一起忍饥受寒，一起经受生死考验。她利用一切机会对外宣传八路军的抗战事迹，为八路军募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呼吁外国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

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史沫特莱不得不从前线转到汉口。她在那里参加了红十字救护总队，一边东奔西走照顾伤员，一边向全世界各种组织写报告，希望能为中国部队争取到一些战争物资。在她看来，尽管自己是美国人，却已经变成了中国抗日斗争的一员。

返美之后仍然心系中国

常年经历战火硝烟的生活导致史沫特莱积劳成疾。1941 年末，史沫特莱因病不得不返回美国。返美之后，她仍心系中国。她在全美各地以及英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巡回演讲，告诉世界中国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战，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中国援助。她还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中国的战歌》一书。书中以满腔热情向世界讲述中国军民的顽强斗争。史沫特莱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通讯员”或“记者”，而是一名反法西斯战士。

继《中国的战歌》之后，史沫特莱又着手写作朱德传记。她被朱德那种农家出身、亲切真诚的人格所感染，认为朱德身上散发着西方政治精英所没有的朴实特质。她将朱德的个人经历与中国历史相交织，向世界讲述朱德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讲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斗争史。她始终怀念中国，原本打算完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书稿后就取道英国来华，但在 1949 年到达伦敦后病情恶化，无法再来中国，最后于 1950 年去世。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仍在进行书稿的修订工作。后来，遵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实现了她回归中国的愿望。

史沫特莱是一位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她曾辗转于美国、德国、苏联、中国等地，投身于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英勇作战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她，使她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位奉献于中国的战士。她不顾个人安危传递战争讯息，让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军队奋勇抵抗侵略者的壮举，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真实的风采。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她。



一部中国传统社会史表明，自远古而来的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条极为艰难曲折的漫漫长路。我们的先人战胜了难以胜数的洪灾、旱灾、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抵御了外敌入侵和残酷压迫，沿着自己的道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保国保种的同时，不断走向进步和光明，体现了强大的民族生命力。中华民族创造了符合自身特点、适应传统社会要求的社会制度和体大思精、夺人眼目的灿烂文化，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各有所不同的独特道路。

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八个字大有深意。按照流传既久的说法，全世界共有四大文明古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明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历史十分悠久。距今约 3800—3500 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是中外学界所公认的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之一。201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已认同中国的古代文明迄今有 5000 年。

第二，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自远古至先秦，先之以诸夏，后之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历经周初的封建和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华夏族逐渐形成并发展。自华夏族形成以后，源泉混混，开枝散叶，到汉代形成了汉族。进入唐代，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又有了唐人之称。之后，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不断深入，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第三，文字未曾中断。中国的古文字起源于陶泥刻符、彩绘符号和玉器、石器、骨器刻文等，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初步形成了以方块字为特点、较为成熟而完整的文字系统。之后，经金文、小篆及至隶、草、楷、行的书体演变，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文字系统。

第四，史载传承有序。按照现存的史籍所载，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的共和元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 841 年开始，中国就有了不间断的、系统的历史记载。正史、实录、方志、谱牒等灿然在列，中国成为全世界史学高度发达的古老国度之一。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各种考古发现，我们对历史编年的认证又提前了 2000 年。

第五，文化一脉相承。从商人尊神到周制礼作乐，华夏族实现了由神到人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德治之路，并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继承。之后，中华文化历经各代百家争盛，在相推相荡、相克相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

第六，逐渐奠定了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早熟和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向心力，使中国的人口不断增加，也使国土得到开发、疆土得到有效治理。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巩固，逐渐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

第七，统一成为大势。中国的国体先后经历了邦国时代、封建时代和郡县制时代。其间，邦国的数量先是从周初的上千个急剧减少为春秋时期的百余个，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雄并峙”的局面，并最终由秦统一中国。之后，割据和统一交替上场。到了宋代，中国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如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和南北方交流，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忠孝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思想。这些重大变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更高水平发展，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

中华文明的八大特性

□ 顾 春

认同。从此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认同统一是常态、割据是变态。自宋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长期和大规模的地方割据，走向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

第八，倡礼义而远宗教。中国人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润身，以仁义之理和等级之礼处理人和事，至于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中国虽长期存续各种宗教，其中既有本土的宗教（道教），也有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但自西周走上敬德保民之路后，中国人更相信道德的力量，用人伦礼义规约人，用美德良俗提升人，不需要宗教来约束人，更不需要用宗教来代替政治和法律。因而，自西周以后，中国多数时代是世俗社会占主导，很少有过神教合一的统治，也很少出现宗教法庭。

以上论及的八方面，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国走过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所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中国与欧洲的实力对比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也因此经历过一个转变，即从欣羡向往转变成抱有偏见与妄断，其中包括对古老中国文明起源的偏见。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外来文明传播论”，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古代西方文明传播来的，不是本土文明起源。但 19 世纪以后中国考古与历史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证明中国文明是本土独立起源，是多源共生的文明统一体。

古人类遗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根

1929 年，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地区挖掘出古人类头盖骨，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为“北京人”，北京人生活在更新世中期，距今约 50 万年前，属于智人。1963 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猿人下颌骨，从地质年代来说，也属于更新世中期，这里也有石器发现，与北京人时代大致相同。1957 年到 1959 年，在山西芮城县的庙河附近，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上这些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1953 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旧石器与哺乳动物化石，次年发现 3 枚人类牙齿，吴汝康教授认为，丁村人是中国猿人与现代人的过渡阶段。丁村人生存时间与尼安德特人接近，特征与蒙古人种接近，与白种人不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于智人阶段，在中国发现的柳江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都属于这一阶段。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河套人与山顶洞人的发现，这些发掘不只是个别人种的发现，而且是一种重要文化遗址的发掘，都有大

量的石器、动物化石出土。据裴文判断，河套人与山顶洞人已经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这个时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进入了文明社会。裴文认为，山顶洞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从石器的使用发展为骨角品的广泛应用，是由原始向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划时代变化。此后，人类社会组织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证明，中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古人类从体质上完成了向现代人类的进化，生产上经历了早期的采集与渔猎活动，开始了农业文明新阶段。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学会了利用火来加工食物，开始建造房屋，发展了生产工具，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可以说，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新石器与陶泥时代考古研究为中国文明本土起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21 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被发现，此文化具有典型的农耕生产性质，出土的彩陶精美异常，其中包含技术水平极高的汲水瓶等物件。1928 年，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了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遗

址联结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田野挖掘主持人李济指出，其意义即在于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1936 年，在浙江余杭县良渚镇发现了古遗址，考古学家夏鼐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2019 年，世界遗产中心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宣布，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古城模式有自己的特色，城镇建设、稻作农业水利灌溉系统、分等级的墓地与主持礼法仪式的祭坛、有序的社会分工和统一信仰等，都是中国文明本土起源的主要标志。

以人文精神容纳多元文明

中国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主要特点在于：中国文明是一种人文文明，能够容纳多元化的信仰与崇拜。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多以单一的神明崇拜为主，埃及人崇拜太阳神，法老是太阳神的人间之子；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以大神和城邦保护神为主；以色列犹太文明更是信仰上帝的一神教文明；即使是后起的希腊罗马也从多神信仰最后转化为基督教信仰。

但中国古代文明始祖黄帝却被称为“人文初祖”。《易经·大有》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黄帝主导的以德为中心观念的礼法制度，是顺应天时的人文精神。它的秩序是“浚哲文明，温恭永塞”，而不是用圣战或征服异教徒的战争手段来定立秩序。

中国的人文精神，用《易经》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一种可以容纳汇聚多种族、部族共同进步的人文和谐精神。没有唯一的主与神，各信仰与族群之间是平等的，是以人文精神协调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自身文明的逻辑基础上，中国建立了社会基本秩序，这就是礼法制度。《史记·秦本纪》说：“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冯友兰指出，古代的礼就是法。孔子后来所称颂的礼乐就是这种文明秩序。

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态

这种协和万邦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礼法制度，超越任何族群和地域的差异。在欧亚大陆东部广袤的地域中，多种来源的习俗信仰和生